

# 遗孀林洙:后来才读懂的梁思成(下) ◆ 罗屿

林洙曾久久地想,为什么过去活跃、诙谐的丈夫,却变得谈起话来空洞乏味?

“因为他一直在和自己打仗。”林洙说,梁思成始终坚信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因此他毫不怀疑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与必要,“而他认为自己受了资产阶级教育,他怀疑他在学术领域领错了路。他的‘建筑观’与‘教育思想’被砸得粉碎,这使得他成了一个被抽掉了灵魂的人。”

“他认定自己错了,但他不知道错在哪里。”林洙记得,梁思成在最后的岁月里,曾黯然地说:“如果再让我从头学一遍建筑,也许我还是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他想搞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建筑观’,他想和自己的学生朋友讨论‘教育革命’,讨论‘怎样在建筑领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是,他病房的会客牌总是静静地挂在医院传达室里。”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去世。就在几天前的元旦,他听完《人民日报》的社论后对林洙说:“台湾回归祖国我是看不见了,等到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

几十年来,总有朋友对林洙说:“你命好苦!”因为她与梁思成共同生活的年代,大部分在“文革”时期,但是她说,自己心甘情愿陪他走完他一生中最高坎、苦难最深重,也是最悲惨的一段路程。“我从后悔自己的选择,并感谢上帝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

## 因为路过你的路

因为苦过你的苦  
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  
追逐着你的追逐

梁思成去世后,林洙时刻都在想他一生的功与过。

在她看来,丈夫留下的古建调查报告,是后人继续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据。于是,在“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后,林洙给邓小平写

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有两点:其一,要求修改《辞海》中有关梁思成“反动权威”的条目;其二,她希望整理出版梁思成遗著。

邓小平很快将信批复有关单位,“梁思成文集”编委会随后成立,林洙负责选配文集中所有图片。

“最困难的是为《中国雕塑史》配图,雕塑史是1930年梁思成在东北大学的讲课提纲,只有文字,没有图片。”林洙说,当时她读着丈夫的讲课提纲,看着上面标注的“见(Ox×图)”一筹莫展。直到一日,见到笔记中Oswald一词,她断定O必定是Oswald简写,于是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求助,“我找到咨询部一位老先生,但其实特别难为情,我说,我要找一本外国著作,但不知书名,不知作者,只知作者姓名打头字母是O,而且书应当很厚,因为图片标到了几百号。”老先生听后,当即给林洙找出了Oswald Siren所著的《中国雕塑》,上、中、下三大册。林洙对着笔记一张张核对图片,竟全部对上。但三本书不能外借,于是她天天泡在图书馆,泡了一个多月。“就像梁思成常说的,‘笨人下的笨功夫’。”

林洙类似的“笨功夫”下得不少。当年,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地管理处,都收到过她的信,问对方能否帮忙拍摄照片。“很感谢那些不知名的朋友,拍了清晰精美的图片寄给我,不肯收一分钱。”林洙笑着说,“不过那时,我确实也拿不出多余的钱。一个月工资62块,养活两个孩子还有母亲,多拿一分都没有可能。”

林洙说,梁思成在她的心中并非一个固定的形象。“文革”前,她看到的是丈夫的温柔体贴;“文革”时,她则体会到他的正直严肃。“永远实事求是,从不落井下石。”“这样一个人,我如获至宝。”

当真正开始通读梁思成的著作后,林洙发现,“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形象,实实在在地矗立在自己眼前。”

“为什么他能准确地判断古建筑的建筑年代?这与他深厚的国学根基和对各个时代



书法、绘画、雕塑、陶瓷器皿的研究有密切关系。他常说,调查古建筑要有敏锐的时代感。”“他的《大同古建调查报告》,长达22万字,通过这份报告,可以看出他已经吃透了宋辽时期的建筑,并已读懂了《营造法式》这本‘天书’。”“1946年,他赴美考察讲学,回国后决心办一个世界第一流的建筑系。过去建筑系就是设计房子,他则提出‘人居环境’。”“他对北京市的规划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和学生说过‘我到现在为止,不认为梁陈方案有什么错误。但我不希望你们再继续说这个事情,这样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

谈起梁思成,林洙有说不尽的话。她说自己最悔恨的,就是1969年北京拆除城墙时,梁思成听说西直门发现一个元代城门,像孩子一样恳求她去拍张照片。当年的林洙不假思索地说,“你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林洙忘不了,当时梁思成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

那一刻,林洙以为自己理解了丈夫,“但其实远远没有。当我今天重读《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以及《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时,我才知道,当年我对他的理解很不够……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我才终于读懂了他。”

##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高建国

### 26.导演的导演

在跟班训练和不误戏剧排练的前提下,演职员们还热情为解放军服务,每天早晨起床号吹响后,趁连队官兵在操场集合之际,总有一些演员争先恐后奔向战士寝室收集衣被鞋袜,洗净补好晒干。那段时间,营区大礼堂夜夜灯火通明,剧组不是排练《碧水红旗》,就是演出沪剧传统名剧《罗汉钱》《阿必大》《杨乃武与小白菜》和现代戏《鸡毛飞上天》,场场博得满堂喝彩。

一个月下来,剧组获得了排练与体验军营生活双丰收,邵滨孙等人还被部队评为“五好战士”,获得了纪念章和证书。当时59师有4个建制团,部队官兵亲切地把上海人民沪剧团称为“59师第5团”,剧团团长自然为团长,书记为政治委员,剧组被誉为“部队文工团”。

对于不熟悉军营官兵的编剧文牧来说,下到有着“江抗”光荣传统的部队体验生活,收益是全方位和长远的。从刻意创作叫好又叫座的抗日传奇剧,到开始运用我党抗日斗争的战略策略思想,来观照透视东进作战我与日伪惊心动魄、错综复杂的斗争,文牧的创作视野开始走出芦苇荡,创作中自觉将芦苇荡与全国抗日大战场联系在一起,大大深化了剧作的主题。再加上文牧一向善于广征博采,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择善而从,从军营返回上海后,再次修改提高显得顺手多了。

为了使演员们直观真切地感受阳澄湖芦苇荡奇特而又艰苦的斗争生活,为准确把握剧中角色心理和一招一式奠定坚实生活基础,党总支书记兼副团长陈荣兰专门带领剧组演职员,到新生四伤病员战斗过的常熟横泾乡采风 and 体验生活,演员们穿行芦苇荡,泛舟湖上,在水天交融中感受创作意境。

常熟市沙家浜革命传统纪念馆中,陈列着当年上海人民沪剧团党总支书记、副团长陈荣兰,率领《芦荡火种》剧组人员在阳澄湖芦苇荡中采风和生活的照片:一张是,陈荣兰手抓船舷,半身浸在湖水里,在浪遏飞舟



中体验当年伤病员水上坚守的艰辛;另一张是,上海人民沪剧团演员行进在湖畔芦苇丛中。

走在阳澄湖畔崎岖泥泞的水乡小径上,在东方大都市饱受海派文化濡染而对湖区生活十分陌生的演员们,感觉自己不仅置身于剧中角色生活的环境,而且已经开始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并逐渐融为一体了。

“陈荣兰是《芦荡火种》导演的导演!”2015年7月5日上午,原上海人民沪剧团导演王仁兴大姐,不胜感慨地对我这样说。

王仁兴原籍山东招远,1934年生在上海,1949年上海刚一解放即参军来到第20军文工团,和陈荣兰等人一起睡起了毛森公馆打了蜡的地板。作为熟知《芦荡火种》创作全过程为数不多的见证人,回首半个多世纪前筭路蓝缕的创作史,她的心情仍然十分激动。

“上海人民沪剧团是由夫妻演员为基础的两个私营剧团,响应政府号召合并而成的国有剧团,要使原来属于不同剧团的演员合力共同创演革命现代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开始,团里对搞现代戏的呼声并不是很高,一些有成就的老演员对搞过久的传统戏轻车熟路,对贴近老百姓的创新探索心里并没有底。另外,丁是娥原来属于上艺沪剧团,石筱英属于中艺沪剧团,丁是娥演主角阿庆嫂,同样优秀的女演员石筱英只能演配角沙奶奶。如何让大家正确对待角色分工、心甘情愿做好绿叶扶红花的事情,陈荣兰做了大量工作。还有,陈荣兰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新四军和解放军女战士,《芦荡火种》的导演杨文龙也是从军队转业来的,他们在艰苦的武装斗争年代,从切身体验中深刻地懂得了军民鱼水深情和血肉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在组织艺术创作中,才能自觉挖掘和全力表现这一主题。那时候创作和排演一台戏,都是领导、专家和演员群策群力,是集集体智慧和大力协作的结果。《芦荡火种》的主要执笔人是文牧,但阿庆嫂有一段较长的内心独白唱段,陈荣兰就安排更熟悉生活的女编剧宗华来改写。创作沪剧《鸡毛飞上天》时,得知一个民办教师的事迹很先进,领导和专家都去了,后来连演员也参与台词的修改。就是今天,这种三结合创作的模式和方法也应该大力提倡!”

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启动“全面二孩”政策,意味着实施了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宣告终结,政策层面的独生子女家庭将不复存在。报告文学《中国“失独”家庭调查》(节选),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变革的历史节点,回望失独家庭这一“一胎”政策的伴生物。除了失独家庭问题本身,这部作品的作者同样引发关注。他并不是一位职业作家,而是一位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

### 1.为“失独”父母们提供有力保障

2015年2月17日,离乙未羊年春节还有两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团拜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到家庭建设时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总书记的话语还在耳边萦绕,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向全国人民承诺,民之疾苦,国之要事,我们要竭尽全力,坚决把民生底线兜住兜牢。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铿锵之音,宣示了共和国的信心和决心。各级党委、政府在党中央的引领下,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竭尽全力,出台了一项最优惠的政策,打造出一把把坚强有力的“制度手杖”,为“失独”父母们提供有力保障。

据有关资料反映,“失独”现象出现在本世纪初,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多。卫生部《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及其他有关资料做过统计,目前我国有“失独”家庭一百万,且以每年7.6万的数量持续增加。这些失去独生子女的老人,面临生活照料、大病医治、养老保障、精神慰藉、后嗣传承、丧葬善后等各种困难。

陕西省人民政府率先出台了《关于建立完善“失独”家庭养老扶助制度的意见》。对“失独”家庭提出了五条“真金白银”的关爱措施:一是提高“失独”家庭扶助标准,农村居民

每人每月提高到八百元,城镇居民每人每月提高到一千元,同时建立“失独”家庭养老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随着全省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的增长,逐步提高“失独”家庭的扶助标准;二是对“失独”家庭给予一次性补助,农村家庭两万元,城镇家庭三万元;三是鼓励“失独”家庭再生育,所需经费由省级财政承担;四是完善“失独”家庭优先优惠的

社会福利政策,由户籍所在地县、区人民政府按照就近就近和自愿的原则,安置在敬老院生活;五是积极开展关爱“失独”家庭活动,组织志愿者队伍,开展对“失独”家庭的心理咨询、精神慰藉、生产帮扶、生活照料等关爱活动。

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化公办养老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首次明确公办养老机构可根据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中失能或七十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参照困境家庭保障对象或优待服务保障对象为其提供政府基本养老服务。为了使文件规定落到实处,市政府根据“失独”老人们提出的希望建立专供“失独”老人养老的福利

机构的要求,决定将坐落于环境优美的亚运村,毗邻北京市老年病医院,交通便利、设施齐全,集老年人颐养、健身、休闲、娱乐和医疗保健为一体的市第五福利院改造为专门接收“失独”老人的示范性养老机构。

贵州省卫计委、民政厅、财政厅、人社厅、住建厅、教育厅、司法厅、扶贫办、妇联、残联、计生协会等十一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政府相关部门按照“少生育,多保障”的基本原则,着力解决计生特殊家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不断提高计生特殊家庭的生活质量、保障水平、幸福指数;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多方关怀”的工作模式,从经济支持、养老保障、医疗健康、社会关怀等四个方面,逐步建立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计生特殊家庭扶助政策体系,每一项工作都确定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并实行严格的考核问责,确保各个环节的工作落到实处。

## 中国“失独”家庭调查

韩生学

